

# 甘赫維也納會談簡析

\*\*\*\*\*

從一八一四至一五年有名的維也納會談之後，國際會議的舞台就轉移到日內瓦，因此甘赫會談之在維也納舉行，自然頗受奧國歡迎。在會談日期正式發表以前，奧國業已大事準備。五月中，有七千名穿制服的警察和二千名便衣警，就被配置在維也納市內衝要地帶，而赫魯曉夫乘特別列車抵步的南車站及六月四日晨甘迺迪夫婦參加彌撒的聖士提反教堂內記者用的特別看台，也都已準備就緒。這使得白宮新聞秘書沙林吉和蘇俄保安官薩哈洛夫都表示滿意。估計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約達二千人，市內旅館早已全部預定一空。

本來，自五月二十八日起，維也納有為時一週的紀念節日，各地遊客蜂擁而至，加上這項甘赫會談，情形就更熱鬧非凡。可是，這次會談只是六月三、四日兩天，不過十二小時，既沒有議題，也不作任何決定，而且事前雙方都聲明不存過奢的希望。那末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舉行這樣一次會談？我們且對其來龍去脈，試略加以探討。

## 一 會談日期的決定

從甘迺迪總統競選時的若干言論中，使我們獲得一種印象，就是他避免參加沒有準備的高階層會議。這次維也納會談，是於五月十九日由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同時宣佈，距離開會時間僅僅兩週

，而又在美國顯居下風的情形下舉行，因此若干人以爲甘迺迪總統已違悖了他的競選諾言，而共匪更在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中，惡意刻畫甘迺迪是在美國國際地位惡化中，被迫與赫魯會晤，這當然是有意中傷。

事實上，這次會談的宣佈，雖在五月中旬，但早在二月間就開始接觸，那時候甘迺迪就職尚僅三星期。今年二月十一日，美駐俄大使湯普生返國述職，即在白宮與甘迺迪總統、詹森副總統、魯斯克國務卿，就美蘇會談一事從事磋商，並邀前任駐俄大使哈里曼、肯南和包倫參加。其後湯普生攜帶甘迺迪函件返俄，表示希望舉行一次會談，時間可能在暮春，地點可能在一個中立國的歐洲城市。三月九日湯普生趕往新西伯利亞將該函面交赫魯，據報赫魯反應「非常有利」。三月二十七日俄外長葛羅米柯在白宮謁見甘迺迪總統，討論察國問題，並談及甘赫會談，甘氏當即表示願意參加。這些都在古巴事件及寮局惡化之前。五月四日湯普生由莫斯科報告稱，俄方希望知道甘迺迪是否仍願會見赫魯曉夫，並暗示赫魯也許願意避免談及足以使美國感到煩惱的古巴問題等。甘迺迪告知莫斯科，他將與各盟邦磋商後於五月二十日提出答覆。這其間他曾獲得前副總統尼克森氏的贊同，而來自倫敦、巴黎及波昂的反應亦屬有利。當甘迺迪正準備飛往加拿大聘問時，俄駐美大使曼西科夫出現白

宮，面交甘迺迪總統一封函件，重申赫魯曉夫希望會談之意，甘氏當即予以同意。

但無論如何，這並不是甘氏平時主張的有準備的首腦會談，自勿庸諱言。

## 二 促成會談的原因

甘迺迪總統在競選演說中所提出的外交方針，可歸納為幾點，那就是：①確保美國及其同盟國軍事力量的強大，包括消滅美俄導彈的差距。②澈底修正對低度開發國家的援助方針，就是所謂爭取進步聯盟。③就美蘇之間有可能達成協議的問題進行談判。這就是他一手持橄欖枝，一手握箭的政策。

所謂有可能達成協議的問題就是裁軍，首先是核子禁試問題。可是在日內瓦舉行的核子禁試談判，因為蘇俄堅持其由三人指揮的管理委員會的提案，業已陷入無望的僵局。這個由東、西、中立三方各佔一人的三人制原則，是蘇俄的新戰術，這一方面可孤立自由陣營，擴大中立勢力，他方面又可使蘇俄獲得實質的否決權，因之它要將之廣泛應用，從聯合國秘書處以及寮國的國際監督委員會等等，無時無地不是這個三人制作祟，長此以往，不僅將來的裁軍會議，甚至一切國際談判，都將無法獲得進展。這未免使得美國有些着急，亟欲在首腦會議中摸清蘇俄的底牌，獲悉赫魯曉的本意，俾作為今後釐訂新外交政策之借鏡，這恐怕是促成此次甘赫會談的原因之一。可是甘迺迪在返美後的報告中說：「美國想終止核子試驗和緩和軍備競賽的希望已受到一次嚴重的打擊。」可知，在這方面並未獲得絲毫進展。

當古巴革命軍登陸失敗，寮國局勢迅速惡化之後，美國聲譽大受影響，而蘇俄則大有得意忘形之勢。據湯普生報告，赫魯曉夫態

甘赫維也納會談簡析

度狂妄，趾高氣揚，甚至表示他將於今年年底以前對柏林採取行動。這使得華府感覺到需要向赫魯提出一項警告，使他不要在柏林、伊朗或其他地區有任何誤算，而使世界陷於萬劫不復之境。這更是促成此次甘赫會談更為重要的原因。我們看到甘迺迪本人以及美國輿論一再強調警告對美國的强大力量不要有任何誤算，美總統將把美國抵抗侵略的決心面告赫魯，以及甘迺迪與戴高樂會談後前往維也納之前，和維也納會談結束甘迺迪飛英與麥米倫會晤之後，盟國均一再聲明他們對柏林問題的態度一致，實不為無因。實際說來，英、法、西德暫時隱忍，聽任甘赫單獨會談，也是以警告赫魯不要盲目觸發一場核子戰爭為前提的。

會談的動機既屬如此，其會談的範圍自然也就受有限制。甘迺迪本人在巴黎時會談稱，他和赫魯曉夫將會談柏林問題及僵持中的寮國問題和禁止核子試驗等等，而會談公報除聲稱該項會談「甚為有用」外，並重申支持寮國中立，認識寮國內「一種有效停火協議之重要」，內容空泛，自在意中。

## 三 甘迺迪立場未變

甘迺迪在去秋競選時會說：「非至有若干理由相信能就柏林問題，外層太空問題，或者包括核子試驗在內的一般裁軍問題中之任何一項獲得協議，我們不應前往參加『最高階層會議』：非至我們在這裏變得強大起來，非至我們在這裏動起來，舉行一次高階層會議，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主張「悄悄的外交」、正常的外交，雖然他並未與最高階層會議絕緣，但他顯然希望取得一種強有力的地位之後，才同意舉行。在維也納的會談，他並未取得如此一種地位。相反地，這正是美國在古巴、寮國遭遇失敗，而太空人飛行又落後於蘇俄，就時機言，對美國是不利的。不過，我們也不可

輕易認爲他已改變了他朝向這一方向的努力。

自從他就任總統以後，他是在朝向他的目標前進，而從最近的特別咨文以及其他有關舉措中，也可得到證明。

五月二十五日，甘迺迪向國會提出特別咨文，要求以十五億美元的新撥款，來推行他的計劃，並認爲今後再需數十億元。茲擇要敘述如後：

(一)發展太空技術，與蘇俄一爭長短。計劃於六十年代也就是九或十年間，把人送上月球再返回地面。咨文要求本會計年度追加支出六億七千九百萬美元以探求太空，包括上述計劃的五億三千一百萬美元在內。據稱根據此一計劃，今後五年間將需要七十至九十多億美元（據路透社消息，其餘一億四千八百萬元，爲發展原子火箭的三千三百萬元，發展通信衛星的五千萬元，發展觀測衛星的七千五百萬元）。

(二)國防方面要改編軍事戰鬥力量，擴增陸戰隊，增建小型衝突及游擊活動所需要的地面及空中武器。這需要一億美元以上。美國陸軍參謀長戴克將軍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發表文章，列舉了若干實際數字，指出美國對一切核武器，非核武器的大小戰爭，一律準備應付。另外依靠一支特種部隊，以應付共黨的游擊戰。這支部隊係由精良陸軍組成，受過多種訓練，可在任何環境使用任何武器作戰。甘迺迪異常重視特種部隊，將使其於一九六二年度增加一倍。

(三)對外援助方面，咨文要求增撥五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平均分配於軍經援助。這是因爲寮國及其鄰國受共產主義威脅的最近東南亞情勢，使此項援助成爲急需。如果國會通過總統的建議，則全部經濟援外款額將達二十億六千五百萬美元，甘氏稱這是「最低限度用款，也是最緊急用款」。按一九六二年度的援外計劃，甘迺迪

也已提出，其中包括經濟與軍事援助兩部份，稱爲「國際發展暨國際和平與安全法案」，請求以二十八億九千萬美元用於經援（計經濟援助經費十六億九千萬美元，長期借貸權力九億美元，以及動用借款之權力三億美元），並以十八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用於軍援。總額爲四十七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五月三十一日魯斯克國務卿於出席參院外委會作證時稱，軍援部份大部將用於遠東。這當然是爲了應付遠東的緊張局勢。六月五日，美財長狄倫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指出，今後美國對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援貸款將放寬年限，降低利息甚或豁免利息而僅收小數的手續費。這是爭取新興國家的努力。狄倫全力支持甘迺迪五年八十八億國外經濟貸款計劃，並直言把這作爲美國外交的「基本工具」。現甘迺迪正請求國會授權向國庫借用九億元，作爲第一年的經濟開發基金。

此外，五月三十一日，甘迺迪已請求國會對他所成立的和平工作團正式承認，於一九六二會計年度增列預算四千萬美元。據稱本年底以前，該團將派出五百至一千人前往海外工作，截至一九六二年六月，約有二千七百人接受訓練並陸續外派。

以上種種，如獲國會通過，又果能行之有效，都可能增強甘迺迪的實力地位，也將是共黨所畏懼的。假如把核子戰爭解釋爲對付蘇俄，則游擊戰就是對付共匪式的「解放戰爭」，而援外與和平工作團是開發落後地區，防止共黨滲透。這些，共黨都不願見其成功，因之毛匪澤東於四月二十八日接見亞非國家代表時說：甘迺迪政權比艾森豪政權更壞。

特別咨文的提出，是在維也納會談的前夕。甘氏行前曾在民主黨集會中指出：「共黨在彼等之莫斯科會議中，發表解放戰爭的宣言，因此，對吾人作錯誤估計之可能性，經常地存在」。他將以「最偉大革命國家的領袖身份，前赴維也納」，希望「以堅定的信念

通知對方，以及使對方瞭解」。事實上，他也是在防止核子戰爭突然爆發，爲美國爭取時間，充實其實力地位。因之，我們可以說，他的態度以及美國的政策，並沒有基本的改變。

#### 四 蘇俄歡迎高層會談

就蘇俄的立場而言，維也納會談當然是它所希望的，因爲這可以有機會表演其「和平共存」的姿態。本來，從列寧起蘇俄就提出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口號，到了赫魯曉夫就更高唱入雲，甚至有些外國人認爲和平共存與赫魯的政治生命密切連結，和平共存失敗，赫魯也必隨之倒台，這當然是以自由世界的尺度去衡量共黨國家，是不正確的。

赫魯高唱和平共存，自有他的一番陰謀。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蘇俄損失慘重，人員傷亡，工農建設大部破壞，如果不是戰後它從東歐掠奪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從事它的建設，則它的經濟斷難迅速恢復。因此，它害怕挑起另一大戰，乃是事實。另一方面，儘管赫魯因蘇俄太空技術暫時超越美國而趾高氣揚，但他沒有把握打贏一次核子大戰。因此在去年十二月的莫斯科八十一國共黨會議聲明中，一面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就有侵略戰爭的土壤。」一面又強調和平共存的可能性。莫斯科聲明誣蔑美國爲帝國主義的憲兵，而葛羅米柯在蘇俄最高蘇維埃會議報告蘇俄外交政策時，却又明白表示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這正是他們辯證法則的巧妙運用。要緊的是要瞭解赫魯所謂「和平」的意義。一九五九年十月，他在新西伯利亞說：「和平共存政策，乃係在戰爭以外，利用一切手段，以繼續並加強鬥爭之謂。」那正是他在大衛營和艾森豪會談後，經北平返國的途中。說穿了，他是以「和平」的姿態，創造虛偽的安全感，以擴大他的所謂「和平勢力」，鬆弛自由國家的鬥志

，避免毀滅性的核子戰爭。另一方面經由階級鬥爭、民族解放鬥爭，來「埋葬資本主義」。他在維也納向甘迺迪表示他「相信世界將照他的路子走而毋須訴諸戰爭」，就正是這種意義。

赫魯相信「和平共存外交的展開，可由最高首腦間的個人接觸獲得保障。」因此今年蘇俄的訪問外交，當仍繼續執行。截至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次要的蘇俄頭目相繼出國，如到北非和捷克的是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列日涅夫，到印度的是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到法國的是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部長會議文化部長福爾芝娃，到北韓的是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第一副總理柯錫金。而赫魯曉夫因忙於國內農業問題未能抽身，本次到維也納還是他今年第一次出國。

自從去年五月，巴黎首腦會議決裂以來，赫魯曉夫是打擊了美國的威望，甚至影響了美國的大選。但同時也暴露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使得自由國家存有戒心。因之，他不能不耐心地來培養一種有利的氣氛，以期對美國逐漸接近，再度恢復首腦會談。甘迺迪一經當選，立即馳電致賀，期待着他恢復「羅斯福時代的精神」。如果我們不健忘，應該還記得甘迺迪競選時是主張爲U—2飛機事件向蘇俄道歉的，固然我們還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情節在內，我們知道的是蘇俄不再提及U—2事件，抑且釋放RB47的兩位飛行員。在古巴事件中，雖對美國大事抨擊，但事件一結束俄國報紙就提出美古直接會談的建議。

赫魯會攻擊尼克森是一頭看守白菜園的雄山羊，艾森豪只配做幼稚園園長。他譏笑一九五五年的高層會議中，艾森豪一切只憑杜勒斯遞給他的紙條行事，一旦忘記紙條放在何處，就顯得慌張而不知所措。但他對於甘迺迪本人則避免攻擊。雖則甘氏本人也承認維也納會談十分「嚴肅」，在公報上我們也從未發現有空氣「和諧」

「歡洽」等字樣，但有些美國議員却認為赫魔在禮貌上已有進步。凡此種種，只能有兩個解釋：一是赫魔對於這位決心堅強、辯才無礙的年輕總統心存敬畏，不敢放肆。二是赫魔珍惜這有利的開始，希望能促成未來的首腦會議，好讓他重佈其赤色陷阱。

儘管赫魔忸怩作態，但在實際問題他是不會有任何讓步的。雖然雙方都說會談有益，赫魔離維也納前且稱：「余與甘氏之晤談，將有助於促進永久和平，亦有助於解決裁軍問題及導致結束冷戰。」但這些話與甘迺迺回國後的報告大相逕庭。來自柏林的消息說，赫魔曾以兩項備忘錄提交甘氏，其一是蘇俄將在年內與東德單獨訂立和約，另一是將以柏林管制權交給東德。果如此則甘氏警告赫魔不要在柏林等地闖禍的希望，也就打了折扣。關於寮國有了一個空洞的原則，而日內瓦十四國會議上除了共黨代表聲調稍為緩和，毫無其他進展。且正在此時，寮共攻佔了重要據點巴塘，實係對維也納會談或美國之一大諷刺。

我們一向認為西方與共黨舉行高階層會談，不會有什麼成功，於此又可得到一次證明。

## 五 會談的得失

據甘迺迺說，這次會談「至少任何一方作危險的錯誤判斷的機會應比較少了，而且至少和平須部份仰賴其決定的人物已同意保持接觸。」但把這看作一種成就就是令人懷疑的。共產國家把國際會議看作宣傳舞台，只要會議開得成，就是他們的成功。自由國家却不這樣簡單，一次失敗的高階層會議，會造成虛幻的和平空氣，甚至促成自由陣營的分裂，尤其重要的是使若干較小的反共國家，感覺失望。

會談之後，甘迺迺似乎已告訴美國人，他認識了美俄雙方無法

接近的根本立場之不同。他以為當前局勢不容鬆懈亦毋需悲觀。我們很慶幸這次會談並沒有產生一種騙人的「維也納精神」。

在抵達奧國之前，甘氏與素稱高傲的戴高樂總統會談，雖尚有若干未消除的歧見，但却顯然得例外地順利。維也納會談之前，本已徵得英、法、西德的同意。而會後甘氏飛往倫敦，魯斯克往巴黎副國務卿柯勒則前往波昂，分別向盟邦領袖報告。甘氏返美後，又強調自由世界團結一致。暫時還看不到共黨可以施行分化的機會。就最後一點言，詹森副總統遠東之行，不管其原來目的為何，但在將美國反共立場與決心告知那裏的盟友，無疑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們可以說，甘迺迺總統在這些方面，是做得到相當週到的。維也納會談雖無所得，但就目前我們所可能知道的而言，似乎也無所失。

據奧國官方傳出消息，美俄外長可能於數週後舉行會談，赫魔且會對美記者暗示已邀甘迺迺於秋間訪蘇。不過甘氏本人在美國說，他沒打算把本次會談看成最高階層會議，在維也納會談期間也未擬定「若何召開『最高階層會議』之計劃」。我們希望這些都是真話，希望他堅守着他的實力地位的立場。不過我們更進一步，認為即使美國有了足夠的實力地位，與共黨舉行最高階層會議，也仍無好處。共黨絕不諱言他們要「埋葬資本主義」。兩相比較，西方保衛自由和平的目標，即使是商談與實力併用，仍不免是一種積極的防禦。這讓我們想起去年尼克森演說中的幾句話，他說：「當赫魯曉夫說我們的孫子們將生活在共產主義之下時，讓我們說他的孫子們將生活在自由之下。」自由世界應該有這樣一項決心，也應該有促其實現的有效步驟。換句話說，不根本「埋葬」共產主義，它就永遠是人類自由和世界和平的威脅。